

新技术革命 与经济发展对策

——— 范元明 彭克宏 朱嘉明来新疆讲学专集

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3.9



责任编辑：吴莎露 罗克华
封面设计：刘培勤

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发展对策

——温元凯、彭克宏、
朱嘉明来新疆讲学专集

新疆经济技术信息情报研究所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乌鲁木齐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0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4098·16 定价：0.84元

目 录

- 一、关于当前改革和开发的几点看法……温元凯 (1)
 - 二、信息革命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策……温元凯 (49)
 -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彭克宏 (104)
 - 四、中国经济改革的由来、发展及展望
.....朱嘉明 (142)
 - 五、论当前的国民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 的特殊性.....朱 嘉明 (165)
-

关于当前改革和开放的几点看法

温元凯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也是第一次能够到祖国的大西北——新疆来跟同志们探讨一些问题、交换一些意见。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当前改革势态的几点看法；第二部分，改革与开放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如何开创改革与开放的新局面。

一 对当前改革势态的几点看法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改革与开放的趋势正在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们认为改革与开放，在中国正成为一种越来越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之所以这么说，这是有它内在的根据的。尽管，我们在去年年底，或者说，今年上半年，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使人们当前在议论时产生一点忧虑或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改革与开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潮流，而且这将是——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称之为不可逆转，我个人认为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就是，农业责任制的成功，这使我们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十年来在农业方面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的口号，包括从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八字宪法、机械化、农业学大寨运动、基本路线教育等。但是可以这么说，所有那么多运动、口号，没有一个根本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简单的“包”字扭转了我国三十年来农业徘徊不前的局面，使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力和积极性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农业经济出现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好成绩，前所未有的好成绩。我们可以看到，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成为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巨大的潜力、现在的城市体制改革不就是在追求这种潜力吗？这个潜力的解放，在中国来讲非常之大。我们从农村改革看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整个改革的前景，就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前景，一旦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解放，他们就能够创造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成就，所以农业责任制的成功是非常了不起的，而农业责任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处于激烈争论和斗争中。我来自安徽省，安徽省是农业责任制的发源地，最早是在凤阳县。刚开始农业责任制的时候，斗争非常激烈，包括县委内部的会议，党员之中的争论，上下之间的争论，同志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本小说，是安徽省著名的作家、《天云山传奇》的作者鲁彦周同志的作品，叫《彩虹桥》，它从一个侧面描写了农业责任制的改革是怎样在安徽省产生、斗争和发展的，当时这个斗争是从下到上的，非常激烈，安徽省在搞农业责任制包产到户，而对面隔一条街，另外一省就贴出大标语叫“坚决击退来自安徽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但是我们要看到，正象我们前几年在理论界曾经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长期性的口号，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责任制解放

生产力，使农民，尤其象凤阳是一个非常穷的县，一个过去都是逃荒要饭，解放后仍然如此！现在却出现了卖粮难，这一点对我们整个国家进一步展开改革是非常有鼓舞性的。我们那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么一种局面，过去在中国来讲，是乡下人羡慕城里人，农村女孩子都想嫁到城市来，为什么？因为城里人有固定工资，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是现在我们在上海、北京、广州正听到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在交谈中非常羡慕乡下人，今天听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万元户，那里又出现了一个怎样勤劳致富的农民，中国农民从开始买摩托车，到开始出现成批买汽车。在河南，农民都出现了买飞机、装电话、请秘书，这些都使我们城里的专家、教授包括相当一定级别的干部都很难想象，包括市长们恐怕都没有条件个人买汽车，但是现在中国农民可以开始个人买汽车，而且出现了农民买汽车热，现在已经不是几辆，或者象过去做几个样板做几个橱窗。全国的运输专业户，他们所拥有的汽车数已经上升到七万辆，这就不是一个小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公路上跑的是农民的联营汽车，他们还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运输队伍。八四年年底在陕西省，省里的同志就告诉我，农民勤劳致富以后，就很重视人才、重视信息。西安市郊区有一个农民他因为文化低，很重视知识，重视信息，于是他就用一百三十元钱一个月的工资，请了一个同志给他当信息顾问，这个任务非常简单，就是给他看报，重要的信息告诉他，这样一个差事对大部分大学教授来讲恐怕是个不错的差事。另外他还用一百二十元一个月请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来做他的政策顾问，给他出谋划策。有眼光的农民正在创造出过去我们确实很难想象的事情。所以农村局面是

非常鼓舞人的，尤其是中央对农村的改革抓得非常紧，连续几个文件，正促使农村改革走向纵深和提到更高的水平。而且，我们感到更应该令人重视的是中国农业改革具有世界范围的意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考察，苏联发展很快，它实力很雄厚，一年出口三亿吨原油，所以它很富，工业增长也很快，常规武器差不多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国力很雄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得很快。但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代表团在苏联唯一可以给苏联讲的就是大包干。我国农村的责任制、体制改革，对国际共运史有很大的贡献。苏联很快就注意我们中国农村的变化，而且派了很多人来考察。前不久就派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到中国来考察。东欧也是这样，他们对中国非常关心，苏共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它的改革，尤其是农业改革的步伐。最近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苏联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他们同样也看到了这种改革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象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苏联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来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我国现在推行农村责任制，我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不一定找得到，毛泽东同志生前恐怕也没有讲过。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理论的一种发展，而且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非常伟大的贡献。中国现在基本上解决了农业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市场供应问题。现在也可以看到各地的供应非常好，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整个改革的格局上，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经常讲“无农不稳”，十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八亿农民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那么我们十亿人口问题就有

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感到农业改革是我们整个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因素，而且这一点是不可以倒转的，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在农村能够实行倒转过来的制度，重新号召农民去学大寨，集体出工。广大的农民群众，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他们既得到了利益，也尝到了勤劳致富的甜头，但现在的问题是使农业改革走向深入和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这一点是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大趋势的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开放政策，开放政策的成功，开放政策的争论也是很大的，这股南风最早始于广州深圳，办特区，当然包括其他一些特区。办特区是非常不容易的，大约是经过了五、六年，那里原来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刚刚开始办特区的时候。这个非议也非常大，那么这个特区办到现在也五、六年了，大大小小的干部、各种各样的人都到那里去看，这个深圳到底怎么样？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有的甚至把那边写的非常可怕，听说新疆自治区歌舞团在访问深圳的时期，据说有个指示，外出必须两人同行。把他们想象得很可怕，一个人出去是不是很不安全，或者会被绑架，所以有人甚至痛心疾首，破口骂街的都有，有的非常伤心、痛哭流涕。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深圳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的土地上怎么出现了块特区？有人接着讲我们好不容易革命了三十五年，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现在怎么又把洋鬼子请了回来剥削我们工人。有人还看到街头（当然是前两年）上都是穿花花绿绿的青年人，甚至有不少都留着长头发，说这些青年人都象香港青年人一样，所以有人说革命了几十年现在只剩下了一面五星红旗，其他全都港化。那么那些特区的开拓者，尤其是一些领导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甚至有人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当代的李鸿

章(现在听说对李鸿章学术界也是在重新评价,至少他搞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开放是有好处的),所以深圳压力非常大,当时也是非常谨慎小心。那么深圳到底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新疆这样地区将要发展,我希望这里有更多的同志能够到沿海特区去看一看,去洗洗脑筋,我认为很有好处,我们非常需要来更换我们的观念,接受一些新鲜的东西,我个人的看法,特区出现在中国土地上是非常鼓舞人的,我们应该抓住问题的主流,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不要抓住一些枝节问题而不及其余,甚至否定一切。这也是个当前我们非常注意的问题,怎么样来看待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百闻不如一见,我去年和今年都去,今年也刚从那里来,我们在那里看到,正是这些穿着花花绿绿的年青人为主体的特区人,深圳人比我们穿得好,这说明那里是解放,那里生活水平提高,那里生活丰富多采,这实在也是个好事情,今天,再不会指责人家青年人穿得漂亮就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说实在,由于过去我们思想的禁锢,包括生活单调,也反映在穿着单调上,不是一个活跃的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穿军装,这样导致我们的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些穿着花花绿绿的青年,他们是特区的主人,他们双手勤劳,他们正在为中国当代经济史,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所创造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模式”,或者蛇口工业区的“蛇口模式”正在成为中国当代经济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名词。同志们都知道一个“深圳速度”意味着一个专门名词,人们要看到将来词典里面都要收进去什么叫“深圳速度”,就是那里的基建三四天一层楼(迎接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都在盖房子,如果全国都能三天一层楼的话,同志们可以想象我们建

设速度能有多快)，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正在创造中国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今年夏天，我在上海同蛇口工业区的党委书记和上海的市委组织部、人事局的领导在一起算帐，算人均产值的效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上海以全国效益老大自居，人均产值一万元，那么蛇口工业区人均产值算下来二十多万元，他们相当多的企业，创造了比香港甚至比欧洲还要高的劳动产值，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力的曙光——效率。说实在的，我们讲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底优越在哪里？我们给青年人讲，有时候却还嫌有些青年人体会不到，我感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应该体现在它能创造出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深圳，我见到正在出现这样的曙光和势头，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今天早晨，我听广播都有为了迎接自治区成立三十年，改进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的报道，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包括首都北京都有需要解决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的问题。同志们经常在外吃饭，有时高高兴兴地领了客人，最后吃了一肚子气回去。但广州、深圳的服务态度很好，那是都是“微笑服务、站立行动”；另外街上的出租汽车能招手即到。今年，越来越改进，有的同志不小心抓抓头，出租汽车就到了，以为叫车子。这反映他们非常有节奏。现在你一招手汽车呼啦一下子在你面前刹车，总之非常的有节奏。

为什么他们能招手即到呢？我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我非常感兴趣他们的机智，那小青年告诉我说，他们基本工资80元、浮动工资200多元，甚至更多，这在口内是不可想象的。饭店也如此，一般服务员为什么面带笑容呢？他们基本上都能挣一、二百，二三百元，普通的实习服务员也能拿一、二百

元，当然他们微笑。我们的服务员有时拿五六十元，很难笑起来，当然也需要精神文明，我看将来讲精神文明与物质基础要结合起来，没有物质文明，也难有精神文明，应两个文明一起抓。所以我看到深圳现在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那里出现了一系列新事物——效率，从一件小事都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节奏比我们快。

如果出去旅游地方跑得多可以看到我国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地，节奏感可以衡量那里的经济水平。我们有些搞自然科学的同志很有趣，还作过测定，看一看街上人的平均速度。不测不知道一测就测出差距。测定表明，香港人在街上走路的平均速度比内地高四倍，这就是说我们这里比香港要慢四分之三。最近，一家报纸报导了世界各首都行人的平均速度，发现日本最快，而日本尤其以东京最快，节奏感强。我们在国外也有体会，可以看到后面的人，象飞一样超过去，仔细一看那是些穿高跟鞋的法国姑娘，她们走路的速度比我们大小伙子还快，因为她们习惯快节奏，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思考。那里出现非常高的速度，那里的精神文明怎么样？青年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是不是都向钱看，是不是金钱主宰一切？我两次到深圳都半夜到公路边，陪同的同志告诉我，眼前黄颜色的灯，是香港地带。我没有去过香港，没亲眼看到香港，据说那灯光是钠光灯，是英国组装的，灯下是一条封锁公路，公路边靠着我们的铁丝网。“文革”后期多达八万青年冒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成为我们广东地区治安非常头痛的问题，我在国外见到许多偷渡到国外的人，开始是很严重的，作为叛国分子。逃离社会主义祖国，跑到资本主义世界去，抓起来判刑满了，怎么办，据说周总理讲过一次

话，“以教育为主”，后来提出叫非法探亲，教育为主也不行，有些人出去了又偷渡，我在国外遇到一些青年大概几进几出，还有七进七出的，后来只好派民兵巡逻，有的民兵把枪挂在树上偷渡过去，后来因为太多了，老抓起来也不行，监狱也放不下，后来派部队，成为地方治安头痛的事，而且国外报刊经常渲染中国青年逃亡，每年淹死多少等。我们在国外辩论中国到底好不好，他们说你们好，那么为什么青年人都往外跑，很难解释“他们都反动”。怎么那么多人反动，确实说服力不强，我感到深圳特区这批老同志都是非常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他们对我讲，他们开始刚去特区时，那里海滩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漂过来的尸体，他们要掩埋这些尸体，他们都对周围同志们讲，我们抛头颅洒鲜血，先辈打下社会主义江山，我们叫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是天堂，怎么我们的年青人却不爱在天堂里待、喜欢从天堂中逃出去，说明我们天堂有问题，应该改进，他们就向中央打报告办特区，下决心，作出比资本主义更吸引人的环境。结果他们搞特区建设，顶住一切压力与责难，经过短短五年，他们的期望基本达到了。深圳同志都知道，在广东宝安县这么个小小的县，深圳当时是一个叫深圳人民公社的地方，现在建设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现代化、繁荣的、繁华的工业旅游城市。蛇口工业区原来是个小渔村，现在成为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特区的成就非常大，是非常了不起的。

近来有人问深圳人的精神文明状态怎么样，是很有朝气，包括青年人。《深圳青年报》在全国各省市青年报中最活跃，发行量升得最快，现在全国青年报发行都成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发行量还不断上升。我们到那里去也很奇怪，打

开电视都是香港电视，从香港过来非常方便，只要拿回乡证看看就可以，四十分钟就可以到，每天深圳都有十几万甚至更多港澳游客，因此我们的同志，包括做思想工作的同志都很担心，香港人那么多，天天看香港电视，怎么办？年青人会不会给污染坏了？而且香港电视很难禁。广州看香港电视要装鱼骨天线，所以广州市政府，发出通知建议不要装，首先号召干部们带头不要装鱼骨天线，发了通知后至少有一部分干部、党员就把鱼骨天线下了，后来日子久了，又竖起来，后来又下文件，又收起来，据说已经三上三下了。不知深圳下文件没有？因为那边距香港电视台比广州还近，一开就是香港的，据说最近也下过文件叫党员不要看。但家里也有不是党员的，所以也就难以形成命令禁止，后来也就不闻不问了。那么就有人问，天天看香港电视的年青人觉悟是不是比内地的低，拿我个人的看法，深圳的年青人恐怕比内地的高一点，那里的年青人朝气蓬勃，而且我们的有关部门在那里作过调查、蹲点，几个点蹲下来证明深圳的城市犯罪率是全国中小城市中间最低的一个，当然不是说那里没有犯罪，我也有两次在深圳夜里，一次是十二点多，一次是一点多钟到街上溜达，我想看看能不能给我发现阴暗面，两次半夜皆没有发现不三不四的人。至少我没看到，白天更少，确实那里吵架的比我们这里少，比如两辆自行车碰一下，内地人吵半天，在深圳扭头就走，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我们吵架是因为太闲了，吃饱了饭没事作，上班喝茶聊天，张家长李家短，如果是很紧张的劳动就没那么多的事。同志们都知道，一个企业也是这样，如果工作状态都很好，很紧张，人的矛盾也少，如果单位亏损没事做，矛盾就没完没了。这是个简单道理，

而且那里年青人中，产生了一大批能人，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袁振讲过，什么叫蛇口，蛇口就是一批敢于改革的年青人创造的改革的业绩。他就是这样定义的，而且还正在吸引全国一大批理工科尖子到那里去，进了几万知识分子。最近在《光明日报》上，有一个头栏叫作“我们为什么爱深圳”，专门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能人也纷纷南下，包括我们文艺界的能人。包括象刘晓庆、黄宗英、祝希娟等。很有名的文艺界人士都去那里工作。我也和那里很多的年青人座谈过。尤其蛇口工业区，有个培训中心，他们是培养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这个基地非常重要，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相对讲，那里的厂长经理比较年轻。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过全国优秀厂长经理表彰大会，我是评委之一，我看到南方来的厂长经理，年岁显然比较轻，象深圳来的二十九岁的姑娘叫周红，是友谊餐厅的总经理，总的产值有几千万元，非常精明能干，文化水平也不算太高，没上过大学，她有个研究生，是上海人，是她的助理，对她毕躬毕敬。深圳是凭本事而不是凭学历，培养中心里有相当一批年青人非常可爱，报有雄心，他们自称是培养新一代人才，尤其是经济人才，中外合资、对外开放的人才，他们自称是新的经济黄埔军校，自称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当然这个提法可以探讨，但证明他们有雄心。他们已经开到第四期了，我去过两次，给他们二期四期都作过报告，他们提出要抵制扯皮的政治南下，要经济北伐，当然这个提法在宣传上不一定恰当。但是我感到他们有一股雄心。把他们活跃的经济方式从南方推向北方，从沿海推向内地，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我们也发现，那里正在产生出中国新一代的经济强人。同志们可拭

目以待，将来有相当多的经济强人要在那里产生。那里首先是中国效率最高的，那里餐厅中的服务员，到这里恐怕要当你餐厅主任，她见过那套世面你还没见过，就这么回事。我是上海人，上海面对广州挑战，感到压力非常大，现在一座座中外合资宾馆林立，白天鹅、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家，只要你有钱什么人都能进去，门口根本没有人挡驾，不象上海、北京，要局级厅级介绍信才能进，他们没有这一套，服务也是全国最好的。而且南方大厦营业额已超过一向以老大自居的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所以我们看到广州、深圳正在成为全国新的经济中心。尤其是购物中心。在新疆的上海人也不少，过去全国女同志、姑娘们买衣服都要到上海去，上海时装最有名，但现在情况已不同了，现在要到广州、深圳去买，上海人现在都穿广州衣服，他们开玩笑说，上海一个个体户跑一趟广州可以赚两、三千块，就是倒卖衣服。从这里可以看出，开放带来的活力，带来的经济起步的加快，改革步伐的加快。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尤其像邓小平、王震同志今年年初去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以后，非常高兴。我听深圳、珠海的领导同志讲，小平同志刚去的时候，就对他们讲，我是带耳朵来的，意思说不一定表态，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听小平同志表态。结果看了以后非常兴奋，连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也说小平同志从来没有那么好的兴致亲笔，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珠海特区好”几个字，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开放政策，我们办特区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决策。这一点也是马列主义的一种发展，包括现在的“一国两制”我们也要看到。邓小平、王震同志视察特区以后不久，中央就下了一个建国以来最大

的大决策之一：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北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北海、海口，形成了一个开放带，所以，国际上的经济学家很快就议论中国的这个政策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明智的，而且这就形成一个开放带，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黄金经济地带，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议论吗，中国有三个金三角地带吗？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江三角洲，后来北方也有了一个三角洲，沿海开放，这样开放就成了大趋势，就是从点到面，有一位中央领导称为叫象滚车轮式的从南向北，从东向西，我们就形成了对开放内地的支持。内地省区比较有远见的领导人去年抓了开放，我想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该看到开放带来繁荣起飞、政策的加快，促使打开南窗吹南风，当时提出来南北对话到深圳找立足点，找窗口开放的浪潮，从南方推向北方，从沿海推向内地，我想这一点对新疆地区的开发非常重要。我们这次来也带来一些具体的想法，我们想在新疆做点调查研究，将来为新疆做点服务，包括提供一点意见。开放非常重要，过去我们落后就在于封闭和与外面不通，信息交通闭塞。现在开放后，沿海纷纷造机场，改善电讯，这一点也是大趋势，这一点是不可逆转的，今天随着开放中国把古老的大门打开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闭关自守，自行其事。象“文化大革命”导致的那种悲剧，我相信，在中国不可能再重演，而中国要这样的话也会受到世界的制约，因为开放了，你的效益和世界各国的效益就连在一起了，如果你再搞极左的那一套，人家国际资本就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同志们看到我们的政策相对讲也会受到国际上一

定制约，这是由于开放的结果，你搞一个极左政策，香港的恒生指数马上就要下降，你搞一个开明政策，恒生指数马上成为上升，象最近中央谈到，香港恒生指数马上上升突破一个点，所以这一点反过来就形成一种制约，政治将来要走向进一步的民主化，重要的要形成一种自衡力量，没有这种自衡力量就不可能正常发展，这一点我想也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开放政策是不可能逆转的，它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老百姓和领导，都看到了开放的活力，开放可以使入先富起来，可以这么先富起来也就是这些地区。广东的农民现在已不是盖二层楼房，已经是三层楼了，深圳的渔民村，参观以后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二层楼的小别墅，家里门开着，都是老太太小孩子，可以随便进去看，不是指定哪一家样板户让你看，随便你去哪一家，我去看的是中上户人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吴伯主同志家，看了二层楼小别墅，基本上全村样子都差不多，家俱全都是进口的，从香港进口的，捷克式什么的都有。二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有两台——楼上一台，楼下一台，电冰箱两个，楼上一个，厨房一个。还有录音机这里已经淘汰了，不玩了，他们都要求高低声的收录放三用机叫（HaSga），不玩普通录音机了，电饭锅呀，摩托车呀，很难想象，连小平同志看了以后也非常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内地农民要达到这个水平要多少年，工作人员说我看要五十年，他的一个孩子说要一百年。那么他们几年呢？五年。小平同志看后，一位工作人员说，老吴呀你生活比我们邓主任还要好，邓主任家冰箱只有一个，你有两个。五年前就是这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是海上打鱼的渔民，当时国家统一收购，谁也不愿好